

近世东亚儒学研究



陈 来 著

博雅英华·陈来著作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近世东亚儒学研究

陈来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世东亚儒学研究 / 陈来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3

(博雅英华·陈来著作集)

ISBN 978-7-301-29150-4

I. ①近… II. ①陈… III. ①儒学—研究—东亚 IV. ①B222.05 ②B3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28887号

- | | |
|-------|--|
| 书 名 | 近世东亚儒学研究
JINSHI DONGYA RUXUE YANJIU |
| 著作责任者 | 陈 来 著 |
| 责任编辑 | 刘书广 张 晗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9150-4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pkuwsz@126.com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5217 |
| 印 刷 者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730 毫米 × 1020 毫米 A5 12.375 印张 257 千字 |
| |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69.00 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序 言

本书所包含的东亚儒学研究，主要是对中国、韩国、日本历史上的朱子学所做的研究，因此以下就东亚朱子学的研究谈一些看法。

朱子是南宋著名哲学家，儒学大师，在中国哲学史和儒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一生学术成就十分丰富，教育活动也非常广泛，他在古代文化的整理上继往开来，他所建立的哲学思想体系宏大精密，他的思想学说体系在古代被称为朱学。近代学术亦称朱学为朱子学，这是狭义的法，广义的朱子学则包括朱子的门人弟子后学以及历代朱学思想家。因此研究东亚朱子学，必须以研究朱子思想为基础。

在历史上，朱子哲学以理性本体、理性人性、理性方法为基点的理性主义哲学不仅是12世纪以后中国的主流思想，还曾广泛传及东亚其他地区，在近世东亚文明的发展上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韩国历史上，朱子学在高丽后期已经传入朝鲜半岛，在李氏朝鲜朝逐步发展，在16世纪后半期达到兴盛。朝鲜朝崇尚朱子学，使得直到19世纪朱子学一直都是韩国的主流学术，居于正统地位。韩国历史上的朱子学多被称性理学，韩国朱子学促成了朝鲜朝时代的学术繁荣，也形成了韩国性理学具有自己特色的理论发展。

总的说来，朝鲜时代的朱子学，如李退溪、李栗谷，对朱子有深刻的理解，对朱子哲学的某些矛盾有深入的认识，并提出了进一步解决的积极方法，揭示出某些在朱子哲学中隐含的、未得到充分发展的逻辑环节。

比较起来，朝鲜朝性理学讨论的“四七”问题，在中国理学中虽有涉及，但始终未以“四端”和“七情”对举以成为讨论课题，未深入揭示朱子性情说中的矛盾之处。在这一点上朝鲜时代的性理学有很大的贡献。朝鲜时代的朱子学的“四七之辩”看到了朱子哲学中尚未能解决的问题而力求在朱子学内部加以解决。“四七之辩”等韩国朱子学的讨论显示出，朝鲜朝的朱子学家对朱子哲学的理解相当深入，在某些问题和方面有所发展，在这些方面的思考的深度上都超过了同时期中国明代的朱子学。同时，16世纪的韩国朱子学对明代正德、嘉靖时期的阳明心学以及罗钦顺的理学思想皆从正统的朱子学立场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和明确的批判。在这方面也超过了明代同时期的朱子学。

这显示出，只有把朱子学研究的视野扩大到整个东亚的范围，才能看到朱子学与阳明学的深度对话，而这仅仅在中国理

学的视野中是无法看到的。如果说在中国明代的学术思想中看不到朱子学的内部批评（如对于罗钦顺的批评），看不到朱子学对阳明学的同时代的深度理论回应，那么这些都可以在朝鲜朝的朱子学里找到。韩国朱子学的讨论表明，新儒学即性理学的讨论空间在中国和韩国之间已经连成一体，成为共享共通的学术文化。可见研究朱子学、阳明学及其回应与互动，必须把中国和韩国的性理学综合地、比较地加以研究。

在历史上，从东亚文化圈的观点来看，朱子学及其重心有一个东移的过程。明代中期以后，朱子学在中国再没有出现有生命力的哲学家，虽然朱子学从明代到清代仍然维持着正统学术的地位，但作为有生命力的哲学形态在中国已经日趋没落。

而与中国明代中后期心学盛行刚好对应，16世纪中期朱子学在韩国获得了发展的活力，达到了相当的深度，朱子学的学者群体也达到了相当的规模。16世纪朝鲜朝朱子学的兴起和发达，一方面表明了朝鲜性理学的完全成熟，另一方面也表明朱子学的重心已经移到韩国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新的生命，也为此后在东亚的进一步扩大准备了基础和条件。如果说退溪、高峰、栗谷的出现标志着朱子学的中心在16世纪已经转移到韩国，此后，当17世纪以后朝鲜后期实学兴起，朱子学的重心则进一步东移，朱子学在整个东亚实现了完全的覆盖，使得朱子学真正成为了近世东亚文明共同分享的学术传统，成为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

因此，虽然朱子是东亚朱子学的根源，但中国朱子学与韩国朱子学，不是单一的根源与受容的关系，朱子学文化的中心，

在东亚的视野下是可以移动的。没有东亚的视野，就不能了解东亚文明中朱子学中心的转移、变动。

近世以来（中国明清时代、韩国朝鲜时代、日本江戸时代）东亚各国朱子学使用共同的学术概念，具有共同的问题意识，认同共同的学术渊源，共同构成了这一时代的理学思想、讨论、话语。中国和韩国的朱子学者虽然生活语言不通，文化传统有别，但共同使用汉字和共同的学术语言，以汉文儒学典籍为经典；他们不仅通过经典文本与古人进行交流，也产生了相互之间的交流。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积极地发展了理学的思考，为东亚地区的朱子学普遍性体系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用“一体和多元”来观察东亚朱子学的横向面貌，目前较为大家所接受，就是说东亚朱子学在体系上内在的是一体的，而中国朱子学、韩国朱子学等不同国家地区的朱子学又有各自关注的问题，形成朱子学的多元的面貌。这是没有问题的。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16世纪的韩国朱子学与12世纪以后的中国朱子学相比，在理学的话语、概念、问题意识方面，哲学的普遍性讨论是主体，而附加其上的具体性、脉络性、地域性的因素是次要的。如不能说“四七”的讨论及其出现是朝鲜朝特定社会政治的特殊性造成的，“四七”的讨论更多地是朱子学内在、深入的探究使然。强调脉络性，则会倾向把“四七”的讨论看成韩国政治社会的因素的直接结果。而强调普遍性，才能确认“四七”的讨论是更深层次的朱子学讨论，才能认识韩国朱子学的理论造诣和成就，才能说朝鲜朱子学超过了明代朱子学。朱子学是以其普遍性的义理吸引了东亚各个地区的学者，

朱子学的普遍性义理为这些地区的士人提供了理论思考的框架和工具，提供了价值、道德、伦理和世界观、宇宙观的基础，朱子学成为这一地区共通的学术文化，这在中国和韩国最为明显。

把文化的视野扩大，超出一个国家的边界来看，理学不仅是11世纪以后中国的思想体系，而且是前近代东亚各国占主导地位或有重要影响的思想体系。因而，说理学是近世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共同成就、共同传统，是不算夸张的。从而，就朱子学研究而言，要展现朱子学体现的所有环节，所有实现了的可能性，就需要把中国、韩国的朱子学综合地、比较地加以研究。如“四七”的讨论可以说是朱子学自身所涵有的理论环节，但在中国只是潜在的存在却没有发展，而在韩国则明确实现出来、发展出来。不研究韩国朱子学，就不能确认“四七”或“理发气发”的问题在朱子学体系中的存在和地位。

理学不仅是中国宋明时代的思想，也是韩国朝鲜时代的思想，亦是日本江户时代的思想，如《东亚儒学九论》前言所说，“把东亚各国朱子学的贡献都展示出来，这样才可能把朱子学理学体系的所有逻辑环节和思想发展的可能性都尽可能地揭示出来，也才能把理学和东亚不同地域文化相结合所形成的各种特色呈现出来。”不综合地研究中国和韩国的朱子学，就不可能了解朱子学体系包含的全部逻辑发展的可能性，不能了解朱子学思想体系被挑战的所有可能性，不能了解朱子学多元发展的可能性，不能确认朱子学在各个时期的发展水平，也就不能全面了解朱子学。

“东亚”的概念，用法不一。在一般的理解和使用上，东亚作为地理概念是指中国、韩国、朝鲜、日本、蒙古。但近代以来也有各种不同的使用，如20世纪日本在战争时期所习用的“大东亚”，包括东北亚，也包括东南亚。但无论如何，二战后政治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所用的“东亚”都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若研究东亚的历史和文明，就更不可能离开中国。最近十几年来，“东亚儒学”的提法比较流行，影响所及，连我自己也编了一本《东亚儒学九论》的小书。然而细思起来，这种“东亚儒学”的用法其实不包括中国儒学在内，而专指汉字文化圈内的韩国、日本以及越南的儒学，换言之，这种使用中的东亚不包括中国在内，这是明显不合理的。这也是本书在《东亚儒学九论》的基础上增入四篇朱子思想研究文章的原因。这样可以使得“东亚儒学”的概念更完整。

另一方面，如日本学者子安宣邦所说，日本近代提出“东亚”概念，包括针对中国的一种意图，即以“东亚”来取代“中国文化圈”或消解“中国中心论”。如果今天人们对“东亚”的使用，仍然预设或暗含一种对中国的针对性，在我们看来，那也同样是不可取的。在历史上，中国文明是东亚文化的创造力中心，按照西嶋定生关于东亚细亚世界的看法，构成东亚世界有四大要素，即汉字、儒教、律令、佛教，而这四者都来源于中国文明，以中国为中心而传播至东亚其他地区。因此就东亚文明的历史整体而言，中国文明曾长久发挥了中心的作用，是历史的事实，无可否认。但这不妨碍我们同时肯定，在东亚不同的文化场域，中心是可以移动的，在特定的文化场域，影

响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而 19 世纪末以来，东亚地区各国间的传统关系模式早已解体，中国早已没有中国中心论的意识，而是意识到近代化进程的落后，不断加强对近代西方和近代日本的学习。近代的日本和韩国也早就摆脱了这种意识。因此，坚持消解中国文明中心论或把这一点赋予东亚概念的使用，在今天已经是无的放矢，并没有现实意义。并且，重要的不是使用不使用“东亚”一词，而在于，如何使用东亚概念，赋予东亚概念何种意义。对我们来说，使用东亚的观念，主要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既没有必要否认历史上的东亚结构中曾有其中心，也绝不意味着主张未来的东亚需要一种与历史上一样的中心。尊重东亚的历史和主张当代东亚文化的多元发展，并没有矛盾。当代的东亚应该发扬和合共生的思想，加强相互学习、理解和包容，共同创造一个新的东亚时代。

目 录

序 言	1
朱子《大学章句》的解释特点	1
朱子《中庸章句》及其儒学思想	26
朱子《论语集注》的儒学思想	52
朱子《孟子集注》及其儒学思想	87
朱子理气思想概论	116
李退溪对朱子的继承和发展	154
李退溪与奇高峰的四七理气之辩	170
李退溪心学之研究	188
李退溪性理学的再研究	207
李栗谷理气思想研究	228
宋尤庵与李朝中期的朱子学	273
李牧隐理学思想简论	290
林罗山的理学思想	305

中日韩三国儒学的历史文化特色	339
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东亚传统	
(《德川宗教》读后)	366
“博雅英华·陈来著作集”后记	381

朱子《大学章句》的解释特点

朱子（1130—1200）是宋代儒学的集大成者，朱子的儒学思想是宋代儒学发展的高峰。从儒学史的角度来看，朱熹对儒学发展所作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花费了毕生的时间致力完成并在一生中不断加以修改的《四书章句集注》。朱子对四书所作的研究，集中地体现在他对四书的集结、章句、注释、解说，事实上，他一生的学术精力，大部分都投入在对于四书的注释研究之上，死而后已。

朱熹的四书研究是理学化的四书体系的集中代表。朱子的四书研究，是在整理、编辑北宋以来儒家（主要是道学，也包括与道学亲缘接近的其他儒者）对四书的解释的基础之上，以二程道学思想为主轴，并经过对北宋以来儒家各家的四书解释的全面反思和批判继承，所建立起来的。由二程在北宋开创的注重四书的学术运动，到朱熹手中真正定型和兴起，并借助后

来朱子学派的努力发扬，四书成为宋元明清儒学思想的新的经典体系。

朱子早年就对北宋和南宋初期儒学关于《论语》《孟子》的解释做过整理和编辑，在他四十多岁时写成了四书注释的初稿，此后一直不断修改。朱子在其晚年守漳州的任上把四书合刊为一。他对《论语》《孟子》的注释称为集注，对《大学》《中庸》的注释称为章句，所以后来统称“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在四书集注外，他还著有《四书或问》，对其《四书集注》中的义理论点和素材取舍加以说明和发挥。本篇以《大学》为主，论述朱子儒学思想的特色；但本篇及接下去的三篇文章主要不是从解经学的角度观察四书集注，而是力图展示朱熹是如何通过其四书集注阐发其儒学思想的。

《集注》的叙述特点是：先训读，次解释大意，次引程子、及程门谢氏、游氏、杨氏、尹氏等说，其中引程子最多，而后以“愚谓”“愚按”补足之。与二程不同，朱熹的注释以字的音读和字义为基础，这不仅继承了汉唐经学注重训诂的长处，也有助于科举时代知识人对于经典音读的统一，更便于初学。所以朱熹的《集注》可以说做到了学术性与实用性的统一，这也是他的《集注》能够被作为教本广为流传的原因之一。同时很明显，朱子《集注》在训读后的解释大意中，加进了自己的哲学发挥。

一 《大学章句序》：知其性与全其性

在朱子的四书著作中，对大学的研究和阐发，最具有代表

性，也最集中地表达了朱子的儒学思想。让我们先来看《大学章句序》：

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

三代之隆，其法寔备，然后王官、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

夫以学校之设，其广如此，教之之术，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而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

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

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若《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固小学之支流余裔，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着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

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其它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间。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晦盲否塞，反复沉痾，以及五季之衰，而坏乱极矣！

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顾其为书犹颇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极知僭踰，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①

《大学章句序》是《大学章句》的要领，也是朱子学的重要文献

①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2页。

之一。此文写于朱子 60 岁，是在朱子整个思想成熟定型之后，也是在他大学章句初稿完成十几年之后，所以这篇文章颇能代表他的主要思想。其中包括：

第一，论大学作为教育制度建立的人性论根据。朱子肯定，人人都具有天所赋予的仁义礼智之性；但并不是人人都能知其性，都能全其性。所谓“知其性而全之”，知其性是指对天赋的道德本性能有自觉的了解，全其性是指能完全地保有自己的本性并把它实现出来。为什么人人都有道德本性，却不能知其性、全其性呢，这主要就是“气质之禀”所发生的影响，气质的驳杂使得人往往偏离了自己的本性。由于在圣人以外，大多数人都受到气质不纯的影响，从这里便产生了人的教育的必要性，以改变和去除气质的这种影响。教育在起源上就是气质纯粹的圣人主持教化教育，以使得人人能够恢复其本性，这就是“复其性”。可见，此篇序文一开始就通过“知其性”“全其性”“复其性”这样一些概念，说明了人性的本质内容和现实状态，说明了教育与人性的关系。

在这种人性论里，以“性”和“气”对举，二者都是个体人与生俱来的内在要素，也是影响人的道德自觉和道德实践的主要因素。性是人的本质，而气质则会造成对于本性的蒙蔽、遮蔽。人必须通过修身而去除气质的消极影响，使本性回复到不受蒙蔽和遮蔽的原初状态。这是朱子大学解释的基本哲学框架和出发点，其他具体的解释和发挥都是在此基点上展开的。朱子针对大学教育指出，复其性不是仅仅由个人所能决定和完成的，“君师治教”（君之治、师之教）是一般人得以复其性的